

北平研究院

北平廟宇調查

資料匯編

〔內二區卷〕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

文物出版社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ISBN 978-7-5010-4511-2



9 787501 045112 >

定價：190.00圓

北平研究院

北平廟宇調查

資料匯編

〔內二區卷〕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

◎ 文物出版社

責任編輯：智 樸 李 颺

責任印製：陳 杰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匯編．內二區卷 /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10-4511-2

I. ①北… II. ①中… III. ①寺廟－史料－北京市
IV. ①K928.7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001254號

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匯編（內二區卷）

編 者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出版發行 文物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2號樓

網址 <http://www.wenwu.com>

郵箱 web@wenwu.com

製版印刷 北京圖文天地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新華書店

開 本 889×1194 1/16

印 張 19.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010-4511-2

定 價 190.00圓

本書版權獨家所有，非經授權，不得複製翻印

《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匯編》
整理出版項目工作組

顧 問 謝辰生

主 編 劉曙光

副 主 編 王小梅

參加人員 侯石柱 劉志雄 嵇滄民 赫俊紅

理 炎 韓麗茹 劉季人 步曉紅

楊樹森 黃田帛 楊 琳 李 戈

鄭一萍 王寶蘭 江 原 馬 赫

張楚梅 劉瑛楠 羅婷婷

序 言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收藏的民國時期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是20世紀30年代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為編纂《北平志》而開展的北京城區及近郊廟宇調查所留存下來的寶貴資料。

廟宇調查這件事做得非常干淨利索，在當時和後來都是備受好評的。在當時的條件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僅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完成了對北京九百多處廟宇的調查，其中包括照相、測繪圖紙、摹拓碑碣、文字記錄等繁複的現場工作，為後人留下翔實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三千多張照片、近五百張平面圖、八百多份調查記錄手稿、一千五百多套拓片、六百多份拓片錄文。其計劃之周密、工作效率之高、工作態度之嚴謹、調查內容之豐富，令人歎服。而更值得學習和借鑒的是，當年調查工作的組織策劃者並不拘泥于傳統史學和金石學，而是將照相、測繪和社會調查等新方法與技術手段應用于治史、修志等傳統學術領域，使得這次以修志為目的的廟宇調查，實際成為了一次領時代風氣之先的文物專項調查工作。由于人的敬業，加之目的明確、手段先進，所以獲得的調查資料較為真實、全面地反映了當時北京城廟宇的保存狀況，實為難得。

但是編纂出版《北平志》就頗多艱難，最終沒有完成，令人扼腕。這批資料長期被擱置、塵封，風雨飄搖中成為一段令人揪心的歷史。這批資料，在抗戰時期曾經跟隨北平研究院輾轉遷移；抗戰勝利後又回到北京；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交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留存整理。當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整理、留存這批資料時，是經過文化部文物局鄭振鐸局長、王冶秋副局長同意并備案，可見相當重視。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的杜仙洲、曾權等先生，都為資料的整理和編目付出了大量心血。可惜整理工作始終沒有走上正軌，“文革”期間，資料被打亂後封存，一段時間內竟然被遺忘于人們的記憶之外。2004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再次發現”了這批浸透着前輩學者心血的寶貴文獻資料。消息傳來，曾讓我感慨幾多！

近十年來，在國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先後開展了“院藏歷代金石拓片搶救整理項目”、“院藏歷史照片搶救整理項目”、“院藏珍貴古籍與文物資料搶救保護項目”，基本完成了對院藏資源的清點和登記。我對這幾項工作一向十分支持，也曾經幾次參加他們的會議。但我最關心的還是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和與之相關的歷史文獻，希望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能夠儘快完成整理并向社會公布，以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實際上，這批調查資料近年來在北京歷代帝王廟牌坊重建、什剎海歷史街區保護、妙應寺白塔修繕、廣濟寺保護與志書編纂等文化項目中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許多照片、平面圖、文字記錄和拓片，成為了文物保護與修復項目唯一的參考資料。這幾年，每次見到劉曙光院長，我都會叮囑他設法推動相關工作。今天，我看到了劉院長送來的校樣，看到這批資料經歷了85年的風雨之後能夠得到認真整理、有效保護，並最終得以刊布于世，內心真有不勝之喜。

這批資料，對於宗教史、文化史、建築史、地方史、民俗學等都具有重要價值。對於今天北京和其他古城的文物保護和歷史文化傳承，作用也無可替代。最近這些年來，我非常痛心地看着包括北京在內的許多歷史文化名城遭到了各種各樣的破壞，有的已經把古城弄得面目全非、名存實亡了。這種情況，已經引起了上至中央領導下至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專門就古城保護和文化傳承作出過批示，國家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也在不斷加強，這批資料在保護和復原古都風貌方面的史料價值，愈顯珍貴，而本書的出版，可謂正逢其時。我向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表示祝賀，並希望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繼續做好這個《資料匯編》的編輯出版工作。

是為序。

謝辰生

2015年6月3日

目 錄

凡 例	〇〇一
20世紀30年代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述論	〇〇三
內二區	〇一九
法光禪林	〇二一
土地祠	〇二六
天仙廟	〇二八
三教庵	〇三二
觀音寺	〇三五
雙塔慶壽寺	〇四二
三才關帝廟	〇五三
白衣庵	〇五八
觀音庵	〇六〇
鶯峰寺	〇六二
興隆寺	〇七四
土地祠	〇七八
天仙關帝廟	〇七九
槐抱椿樹庵	〇八四
水月庵	〇八六
石燈吉祥寺	〇八八
關帝廟	〇九八
承恩寺	一〇〇
觀音寺	一〇二
城隍廟	一〇八
關帝廟	一〇九
永泉寺	一一六
都土地廟	一一七
五聖神祠	一三二
自在庵	一三三
鐵關帝廟	一三八

天仙庵.....	一四四
鐵佛寺.....	一四六
圓覺寺.....	一四八
呂祖宮.....	一五一
地藏庵.....	一五五
大石佛寺.....	一五七
天仙庵.....	一六一
護國禪林.....	一六四
清涼禪林.....	一七三
增福財神廟.....	一七六
關帝廟.....	一七七
福壽關帝廟.....	一七八
火神廟.....	一八一
博濟庵.....	一八六
顯佑寺.....	一九六
土地廟.....	二〇二
隆聖庵.....	二〇三
天仙娘娘廟.....	二〇四
張相公廟.....	二〇五
馬神廟.....	二一二
文昌閣.....	二一四
倒座關帝廟.....	二一六
地藏禪林.....	二一八
土地廟.....	二二四
報恩禪寺.....	二二五
彌勒院.....	二二八
北極寺.....	二二九
呂祖閣.....	二三二
顯應觀.....	二四四
三聖祠.....	二五六
土地廟.....	二五七
長清觀.....	二五九
藥王廟.....	二六二
都城隍廟.....	二六四
關帝廟.....	二八五
竈君廟.....	二八八
火神廟.....	二九二
清真禮拜寺.....	二九八
杭宅家祠.....	三〇三

凡 例

1. 本書收錄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所藏民國時期國立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調查時間為1930年至1932年，調查目的是為編纂《北平志》搜集資料。現存調查資料931份，記錄廟宇938座。調查資料包含調查記錄手稿、廟宇平面圖、照片、碑刻與器物拓片，但并非每座廟宇都有以上四項內容，編者是依據現存資料整理出版。此次調查所謂廟宇，泛指寺廟、道觀、壇廟、祠堂、清真寺、教堂等。
2. 廟宇調查是按當時北平行政區劃的分區而進行，本書也將依照當時內城六區、外城五區以及四郊的區劃順序依次編排出版。每區按廟宇調查資料原編號排序。原編號後附現收藏單位的檔案總編號。
3. 本書以每座廟宇為記錄單元，依次按照調查記錄、平面圖、照片、拓片及拓片錄文的順序編排，以方便讀者完整地瞭解和閱覽每座廟宇的調查資料。
4. 調查記錄以錄文方式整理出版，為方便閱讀，加以標點。調查記錄後附注，簡要介紹廟宇情況，以供讀者參考。其中廟宇人員情況引自民國十八年（1929年）《北平特別市宗教調查表》。如發現原稿中有訛誤之處，亦在注中予以說明。
5. 平面圖按原圖縮印，圖下標注原圖比例尺、原圖單位、原圖尺寸。
6. 照片原無內容說明，書中照片文字說明為編者依據調查資料記載及有關文獻進行考證後所增加。
7. 拓片按年代先後順序排序，著錄拓片名稱、年代、尺寸。拓片名稱參照《北平廟宇碑刻目錄》、《北京圖書館藏北京石刻拓片目錄》的拓片名稱。不見于這兩本《目錄》的，碑刻以首題或額題為拓片名稱；器物以器物名稱、銘文題目或內容為拓片名稱。拓片年代，碑刻一般根據刻立的年代，器物一般根據製造的年代。拓片錄文原稿附後，以供讀者讀識碑文參考。
8. 本書收錄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收藏的民國十九年（1930年）北平市公安局印製的《北平特別市城郊地圖》，并于每卷之前附該卷分區地圖，以使讀者瞭解當時北平的行政區劃和廟宇所在方位。



20世紀30年代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述論

王小梅 劉季人

北京是中國歷史上遼、金、元、明、清五朝古都。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經明、清兩代改建、擴建，最終形成了規模宏偉、規劃嚴整、設施完善的古代城市典範。除了皇家宮殿苑囿、政府衙署、貴胄府邸，數量衆多的廟宇也是北京城建築群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北京城最突出的城市特點之一。

北京的廟宇數量之多，在全國可謂首屈一指。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繪製的《京城全圖》，標出了北京城內一千二百多座各類廟宇。民國以降，根據北平市社會局檔案記錄，1928年北平登記在冊的廟宇有1631座。在城區內，幾乎每條主要街道和胡同都有一兩座廟宇。既有氣勢雄偉的皇家敕建大廟，也有小巷深處的當街小廟。這些遍布于城市各個角落的大小廟宇，與當時的社會生活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從皇家到民間，大凡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求財祈福、去禍消災等等，莫不向廟宇求神問卜、燒香還願。一些廟宇每年有固定的開廟日期，即廟會。廟會逐漸從宗教儀式演變成爲城市生活中重要的商業和娛樂場所，在北京歷史與傳統文化特色形成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紀30年代初，國立北平研究院為了編纂《北平志》，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北平廟宇調查，記錄了以北京城區爲主的九百多座廟宇的詳細情況。根據現存檔案記載，民國期間，北平市政府部門曾經分別于1928、1936、1947年開展過三次廟宇登記，主要以管理爲目的、以廟產和人口爲主要登記內容。而北平研究院從1930年開始的這次廟宇調查，則是出于人文的動機，以修志爲目的，由學術機構主導，研究人員參與，采用社會調查與傳統治史方法相結合的手段開展的一次較大規模的文物調查。除了歷史文獻匯編、金石摹拓等傳統方法，還采用了照相、測繪等新的技術手段，借鑒社會調查的形式和方法，留下了大批照片、平面圖、調查記錄、拓片等珍貴資料。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次調查對於後世的意義不同尋常。在此之前從沒有過此種類型與規模的廟宇調查。在此之後，由于日本侵華戰爭和戰後時局動蕩等歷史原因，使這次調查成爲民國時期唯一的一次較為全面記錄北京城區廟宇情況的實地調查。調查成果成爲後人研究宗教史、文化史、建築史，特別是研究北京地方史、文化史、民俗史以及城市格局變遷和開展古都風貌保護所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一 北平研究院開展北平廟宇調查的歷史背景

20世紀20～30年代，是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與學術研究事業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這一時期，北伐戰爭取得勝利，國家基本結束了多年軍閥混戰的局面，進入了一個短暫的、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大批海外留學人員回國，許多西方現代學科、學術方法被引入中國，名家輩出，科研與學術成果豐碩。其中一南一北兩個國立綜合性學術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這個發展歷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為中國近現代科技與學術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中央研究院成立於1928年6月，直轄於國民政府。北平研究院設立於1929年9月，隸屬於國民政府教育部。雖然兩個研究院都冠以“國立”之名稱，但其組織形式、學術群體、研究方向、歷史地位却不盡相同。與中央研究院相比，北平研究院實際是一所地方性的研究機構，整體規模小於中央研究院，學科設置也少於中央研究院。但作為同時代與中央研究院並存的綜合性科研與學術機構，北平研究院有着自身獨特的優勢。自然科學方面，在原子物理、化學、動植物學等研究領域有着國內領先的地位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人文科學方面，有着特色鮮明的研究領域與成果，在古迹與遺址調查、考古發掘、邊疆史地研究、少數民族文字研究、地方民俗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出版和發表了各類專著和論文。其中對於北京地區歷史、地理、民俗的調查與研究，就是一項突出的成果。

（一）北平研究院的建立與發展

北平研究院的建立，是在籌建中央研究院的過程中提出的。1924年，孫中山先生就提出設立“中央學術院”為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的設想。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伊始，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1]等人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提出關於設立中央研究院的議案。1927年5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採納了設立中央研究院的建議，并推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人為籌備委員。在籌備中央研究院的過程中，李石曾又在政治會議上提出設立局部或地方研究院的議案。當時李石曾正在籌建北平大學區，便仿效中央研究院隸屬於中華民國大學院的體制，把擬議中的北平地方研究院規劃在其中，作為北平大學的研究機構。1928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政治會議通過了李石曾關於建立北平大學和北平大學研究院的提議。後來有提議在浙江和北平兩地設兩個中央研究院分院，將北平大學研究院改為中央研究院分院。籌備過程中，蔡元培不贊成把地方研究院劃做中央研究院的分院，主張地方研究院應是一個獨立的學術機

[1] 李石曾（1881～1973年），又名李煜瀛，筆名石僧、真民。河北高陽人。民國時期著名教育家，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早年曾發起和組織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在巴黎大學學習生物。回國後曾在北京大學執教，創辦中法大學。北平研究院的創建者。1973年卒於臺灣。

構。後經教育部部長蔣夢麟提議使用“國立北平研究院”的名稱，其性質為獨立的學術機構。這個主張得到各方面的贊同，並在1929年8月的行政院會議上通過。最終確定了北平研究院獨立的科學研究機構的性質，一個隸屬民國政府教育部的地方性獨立科研機構，其經費由教育部劃撥。

1929年9月9日，國立北平研究院正式成立，李石曾任院長，李書華^[2]任副院長。北平研究院下設總辦事處，前後成立物理學、鑄學、化學、藥學、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史學研究所（會）等研究機構，還與國立西北農學院在陝西武功合組中國西北植物調查所。學者將北平研究院20年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創設發展時期（1929～1937年），抗戰遷滇時期（1937～1945年），復原至暫停時期（1945～1949年）。第一個時期的七年，是北平研究院發展的黃金時期，各項工作處在一個有序而快速的發展階段，大部分科研工作與成果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和取得的。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後，北平研究院的許多工作也被迫中斷。1938年北平研究院大部分機構遷至雲南昆明。1945年抗戰勝利後，陸續遷回北平。1938～1949年，北平研究院雖然仍在有限的條件下開展工作，但因戰爭和戰後時局的動蕩不安，經費不足，條件受限，人員減少，使得科研工作舉步維艱，科研與學術成果明顯下降。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3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正式接管了北平研究院。同年9月，中央政府確定成立新的科學院，即中國科學院。11月，中國科學院從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處接收北平研究院總辦事處及其在北平的六個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的科研力量轉而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中，北平研究院的組織創立者和專家學者在“學理與實用並重”的原則指導下，開展了大量艱苦的、創造性的工作，在科學探索與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頗為豐碩的研究成果。20年中，北平研究院科研人員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六百餘篇，出版各類專著五十餘種，成立了中國最早的放射性物質研究機構。20年中，北平研究院的組織機構也逐步發展和完善，為科學探索與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北平研究院在中國近現代科學事業發展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有着重要的地位。

關於北平研究院，已有不少學者對其發展歷史、組織機構、管理模式、學術成就等進行了深入研究，論著頗多，在此就不贅述。本文重點對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所）及其所開展的北平廟宇調查的相關情況進行論述。

[2] 李書華（1889～1979年），河北昌黎人。物理學家、教育家。早年留學法國，獲得了法國國家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執教于北京大學、中法大學。北平研究院創建者之一，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長，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部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949年移居國外，1979年病逝于紐約。

(二) 史學研究會(所)的發展與成果

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所)成立於1929年11月,成立之初稱史學研究會,1936年8月改為史學研究所,是北平研究院唯一的人文科學方面的研究機構。成立之初,辦公地點設在中南海懷仁堂西四所。

史學研究會(所)成立之時確立的研究方向和工作重點有四項:(1)編纂北平志;(2)編纂北方革命史;(3)編纂清代通鑒長編;(4)考古工作。這四項工作始終貫穿於史學研究會(所)20年的工作中。

史學研究會(所)先後聘請吳稚暉^[3]、李宗侗^[4]、張繼、白眉初、朱希祖、朱啟鈐、沈尹默、沈兼士、汪申、金兆棧、俞同奎、徐炳昶、馬衡、馬廉、陳垣、樂均士、齊宗康、顧頡剛、蕭瑜、鄭穎孫等為會員。吳稚暉、李宗侗為常務會員,李宗侗兼幹事。

專任編輯有褚葆衡、高靜濤、瞿宣穎、徐炳昶、吳世昌、董炳寅、吳豐培、鮑汴、張江裁、常惠、劉厚滋等。

助理員有石兆原、何士驥、邵君樸、常惠、許道齡、劉師儀、蘇秉琦等。

調查員有李九皋、何子奇。

書記有范綏青、翁瑞昌、張江裁、闕墨青、常硯農、鮑季貞、曲振綱、張子玉、馬豐、鄧詩熙、趙純等。

研究會成立之初,人員分成兩組,一組為調查編輯組,由李書華任主任;另一組為考古組,由徐炳昶^[5]任主任。1935年7月,調查編輯組改為歷史組,由顧頡剛^[6]任主任。考古組不變。

在北平研究院20年的歷史中,史學研究會(所)按照既定的學術發展規劃,開展了大量的工作,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3] 吳稚暉(1865~1953年),又名敬恒,江蘇武進人。1902年加入上海愛國學社,曾參與《蘇報》工作。1905年在法國參加中國同盟會,出版《新世紀》報。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1924年起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1927年支持蔣介石反共清黨活動。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年卒於臺灣。

[4] 李宗侗(1895~1974年),字玄伯,河北高陽人。晚清名臣李鴻藻之孫。早年留學法國,畢業於巴黎大學。1924年返國,執教於北京大學、中法大學。1926~1933年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參與故宮文物清理和接收。抗日戰爭期間,護送故宮文物南遷寧滬和重慶。1948年故宮文物遷臺,參與清點整理,設立臺北故宮博物院。後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5] 徐炳昶(1888~1976年),字旭生,河南唐河人。早年留學法國,曾執教北京大學、北平女子師大和北京師範大學。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主任、史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一直致力於史前研究和考古研究。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史前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貢獻。

[6] 顧頡剛(1893~1980年),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江蘇蘇州人。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1920年,顧頡剛畢業於北京大學,後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雲南大學、蘭州大學等校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等職。

考古方面，主要有常惠等人對河北易縣燕下都故址的發掘；徐炳昶、常惠、何士驥等對陝西豐鎬、大邱、雍、阿房宮、陳寶祠等遺址的調查；徐炳昶、蘇秉琦、何士驥、白萬玉、龔元忠對陝西寶雞鬥雞臺遺址的發掘；徐炳昶、顧頡剛、龔元忠、馬豐等對河北磁縣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的南北朝時代之佛窟石刻等古迹的調查；徐炳昶、顧頡剛對邯鄲縣趙王城和曲陽縣恒山廟的調查；黃文弼對羅布淖爾的考古調查。

歷史研究方面，主要分為編纂《北平志》及一般史籍與史料的整理與研究。為編纂《北平志》，姚彤章、常惠、李至廣、吳世昌、張江裁、許道齡等開展了北平廟宇調查，對每一處廟宇進行照相、繪製平面圖、拓碑和文字記錄，根據這些材料陸續編成《北平廟宇通檢》、《北平廟宇碑刻目錄》、《北平金石目》等書；張江裁開展了北平風俗研究，撰寫了《北平歲時志》、《北平天橋志》；鮑汴、許道齡等人編纂《北平廟宇志》；徐炳昶開展關於中國古史傳說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及關於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許道齡以國子監明清進士題名碑與歷朝進士題名錄互相校對，編纂《中國進士匯典》；顧頡剛、徐文珊開展的《史記》校點及索引；白壽彝在宋元學術史方面開展的研究；馮家昇、吳豐培對邊疆史料的整理；王靜如對回鶻、突厥、西夏文字的研究；馮家昇對於火藥的發明及其西傳的研究；程溯洛對於南宋初年財政的研究；尚愛松對魏晉玄學的研究；鍾鳳年的《水經注》校補等。此外還有對太平天國、秘密社會的史料搜集與整理等工作。史學研究會（所）還創辦了史學學術專刊《史學集刊》。

史學研究會（所）匯集了一批優秀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在短短的20年裏，經過不懈的努力，把史學研究會（所）辦成了民國時期國內較有影響的研究機構。

二 北平廟宇調查的緣起與經過

編纂《北平志》居史學研究會的四項主要工作之首，由調查編纂組承擔。1930年1月，史學研究會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擬定了編輯《北平志》的辦法。11月舉行第二次會議，決定了編輯《北平志》的體例及整理史料的方法。《北平志》以記述北平近代之史迹為主旨，尤注重於社會狀況之變遷，志的內容定為六略：疆理略（地理記述）、營建略（人工建築）、經政略（地方行政設施）、民物志（社會狀況記述）、風俗略（民俗調查）、文獻志（北平史料）。成立了編定委員會，會員包括：陳垣、馬衡、朱希祖、徐炳昶、顧頡剛、李宗侗、翁文灝七人。

其中“營建略”包括城垣，故宮，公務機關（衙署、營房、倉庫、使館），文化機關（學校、觀象臺、辟雍、孔廟），宗教建築（佛道寺觀祠宇、耶回教堂及其他宗教建築），慈善機關（醫院、孤兒院、粥廠），會所（會館公所），店肆（市場及私家商店），娛樂處所，園宅（名人故居），街巷，河渠，郊苑，冢墓。

1930年1月史學研究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確定編纂《北平志》後，調查編纂組首先展開了對北平宗教建築的調查，“蓋北平廟宇之多，為全國任何都市所不能及，其關係建築藝術良非淺鮮”^[7]。從1930年3月7日開始，史學研究會開始派員分區調查寺觀、壇廟、祠堂、清真寺、教堂，搜集史料并摹拓石刻^[8]。

調查工作的步驟分為實物調查和史料搜集兩部分。實物調查包括：照相、測繪平面圖、拓取碑碣、調查記錄。史料搜集包括：典籍及文獻的搜集、年表及索引的編製。其中調查記錄是調查人員進行實地調查時對每座廟宇的地址、建築格局、匾額碑刻、殿堂陳設、供奉神佛、修建年代、歷史沿革、院內樹木、僧道人員等情況做的詳細筆錄。“本會調查方法，先以照相提取各建築物之內外各部，以測製平面圖，再就碑碣等項拓取文字，最後仍就其住持僧道及左右鄰居詢問其口耳相傳之歷史，至其他所獲之古器物舊文件等，在可能範圍之內亦必詳密鉤稽。”^[9]

廟宇調查是按當時北平城區的行政區劃分區逐步開展的。民國十七年（1928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北京改稱北平。民國十八年（1929年）北平市由原來的內外城20個區改為11個區，即內城六區，外城五區。“自中華門以東，順皇城外至翠花胡同、馬市大街、東四牌樓、朝陽門大街以南，為內一區；中華門以西，順皇城而北，至大醬坊胡同折而西，豐盛胡同、武定侯胡同以南，為內二區；安定門大街以東，馬市大街、東四牌樓、朝陽門大街以北，為內三區；大醬坊胡同、豐盛胡同、武定侯胡同以北，西安門皇城以北，經棉花胡同、羅兒胡同達于積水潭以西，為內四區；安定門大街以西，積水潭以東，地安門皇城以北，為內五區；皇城以內為內六區。前門大街以東，東珠市口以北，崇文門大街以西，為外一區；前門大街以西，西珠市口以北，宣武門大街以東，為外二區；崇文門大街以東，外城牆垣以北，為外三區；宣武門大街以西，賈家胡同以南，至外城牆垣以北，為外四區；東西珠市口以南，東至天壇東外牆，西至黑窑廠、陶然亭，為外五區。”^[10]四郊設東郊區、南郊區、西郊區、北郊區。

調查工作是在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後開展的。在進行調查之前，先將北平市社會局所藏全市大小廟宇清冊複製全份，作為調查依據^[11]。調查工作首先從外四區開始，調查人員持致公安局各區分局的公函和致各區境內廟寺庵觀公函，說明修志之原委，然後入廟從事工作。在一些調查現場照片中，除了調查

[7] 國立北平研究院：《國立北平研究院概況》，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1933年，第100頁。

[8] 《史學研究會調查北平廟宇碑記報告》，《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1930年第1卷第2期。

[9] 國立北平研究院：《國立北平研究院概況》，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1933年，第100頁。

[10] 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頁。

[11] 吳豐培：《記1935—1937年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北京社會科學》，1986年第2期。